
卢沟桥事件的‘发端’和 所谓‘中国共产党计划’说 ——与坂本夏男商榷

[日] 安井三吉 郎维成译

进入 80 年代后半期以来,在日本一部分人中间,卢沟桥事件——“中国共产党计划”说又重新抬头,他们的主要根据是近年来中国在加强抗日战争史研究中新发表的当事人的回忆录等。就此而言,同以前的“中共计划”说有所不同。如果说冈野笃夫的《卢沟桥事件》(旺史社 1988 年版)是其开端,那么坂本夏男氏的最近著述,就是这种倾向的代表著作了。

就我所知,坂本氏的关于卢沟桥事件的著述有:《对卢沟桥事件的两个通说的质疑》(《艺林》,1981 年 9 月)、《卢沟桥事件爆发之际,牟田口廉也联队长发起战斗之决心》(《皇学馆大学史料编纂所报史料》,1984 年 1 月 10 日)、《关于卢沟桥事件爆发通说之考察——以研讨七七事变纪实为中心》(《皇学馆论丛》,1985 年 8 月)、《关于中国历史学者的卢沟桥事件爆发观之研究》(《皇学馆论丛》,1990 年 12 月)、《关于卢沟桥事件爆发的一个实证》(《艺林》,1991 年 2 月)、《关于卢沟桥事件爆发的一个实证》(国民会馆,1993 年)。

坂本氏的方法是实证性的,以史料和当事人的证言为基础,对事实进行个案研究。他比较细致地介绍了牟田口廉也的《卢沟桥事件发端真相》和平尾治的《蒙特种情报机关长手记——我的暂短青春》等。然而,作为实证研究,倘若只凭一部分史料,而无视其他史料,其结论就难免陷入片面性。坂本氏的卢沟桥事件的研究,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关于卢沟桥事件的全貌,请参阅拙著《卢沟桥事

件》(研文出版社1993年版)。^①本文仅就坂本氏所特别强调的两个论点,即关于卢沟桥事件的“发端”和“中共计划”说,作一评介。不过,引文没有事先打招呼,还请包涵。

一 关于卢沟桥事件的“发端”

中日两国军队在卢沟桥进入交战状态的时间是1937年7月8日晨5时30分。其经过,坂本氏是这样记述的:

一木大队长认定中国军队确实抱有敌意,牟田口联队长准许一木开始战斗。但其具有决定意义的直接动机,是中国军队于8日晨3时25分,向第八中队骑兵传令兵发射3发子弹。而7日晚10时40分左右的中国军队向第八中队的射击,以及志村二等兵去向不明等情,同8日晨5时30分的日中两军冲突,没有什么联系。^②

如此看来,坂本认为卢沟桥事件的直接契机,是7月8日晨3时25分的射击。我也很重视围绕这个“射击”而出现的一些问题。牟田口联队长向一木大队长下达对驻屯卢沟桥的第二十九军攻击命令的理由,既不是7月7日夜的“不法射击”,也不是“一名士兵去向不明”;而是8日晨3时25分的“射击”。也就是说,卢沟桥事件的发生,既不在于所谓的“第一枪”,也不在于“一名士兵失踪”。对此,我有同感。但是,也有一些疑点,令人费解。“一名士兵去向不明”问题解决之后,第三大队为什么不撤回丰台?8日晨3时25

① 冈野笃夫:《“学者研究”之责任——读安井三吉教授的《卢沟桥事件》(自由),1994年1月号)一文,将拙著的立场认定为卢沟桥事件=“日本计划”说,并在此误解的基础上,站在“对华二十一条要求”的“条文谁也没见到”、“这个要求的真正受害者不是中国,至少中国人并没有感到有什么负担”的中国近代史观立场上,对我进行了批评。拙稿《进一步推进卢沟桥事件研究——答冈野笃夫氏的批评》(自由),1994年6月号),反驳了冈野论文的观点,请参阅。

② 坂本夏男:《关于中国历史学者的卢沟桥事件爆发观之研究》,《皇学馆论丛》,1990年12月,第7—8页。

分的‘射击’，果真像坂本所说的那样吗？牟田口决定对中国军队发动攻击，仅仅是因为发生了‘射击’吗？我想以这些问题为中心，研讨坂本的论述。

（一）驻屯在丰台的第三大队出动的理由，不是“不法射击”，而是“一名士兵去向不明”。可是，一木在8日晨2时3分就知道了‘去向不明’问题已经解决，而且此事同中国方面的活动毫无关系。按理说，这时应该让大队撤回丰台。如此，日本方面在毫无损失的情况下，就把问题解决了。然而，关于这个经过，坂本却是这样写的：

该大队长，晨2时许，在西五里店西端碰见清水中队长，听取了报告，并传达了牟田口联队长的意旨及自己的决心。不久，掌握了刚刚到来的大队主力，决定晨3时20分，占领一文字山，待天亮。（18页^①，重点号是安井三吉标出，下同）

坂本的这个记述，大概是根据《第三大队战斗详报》的如下内容：

大队长晨2时3分在西五里店西端遇见中队长，听取了情况报告，且传达了联队长的意图和表示了大队长的决心，令其立即占领附近的要点一文字山，派出军官潜入，侦察敌情。

‘听取了情况报告’，那么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应该是‘去向不明’的志村菊次郎二等兵及其以后的情况。实际上，一木遇见中队长的时间比这个说法还要早。一木在1938年的《朝日新闻》举办的座谈会上是这样说的：“晨1时许”，在“卢沟桥采砂场”遇见清水，听取了“发现了兵队，无异常情况的报告”。但在解释为什么不让部队撤回丰台的理由时他却说：“接到部队长进行交涉的命令，尚未交涉就撤退，不知中国方面又作什么样的宣传。已有丰台事件先例，不能给他们留下一搞实弹射击，就把日军吓得不敢演习就逃

^① 原文未标篇名，按原文标题，引文当出自坂本夏男《关于卢沟桥事件爆发的一个实证》，以下引坂本语，出处同此，只标页数，译者。

跑了的令人遗憾的印象。所以,无论如何,也要进行严正交涉,所以部队于3时前来到了。^①

从一木的发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第三大队在出动理由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仍不返回丰台而要占领一文字山的真正原因。没有人怀疑坂本对史料《第三大队战斗详报》的忠实态度。然而,他却并没有弄明白一木既然从清水那里得知“去向不明士兵”问题已经解决,为什么还不让大队撤回丰台的动机。

(二)关于“3时25分”的“射击”,坂本是这样写的:

3时25分,听到龙王庙(即回龙庙,下同,编者)方面三声枪响。这是中国军队向传令骑兵岩谷曹长和内田一等兵的射击。他俩被派往丰台,回到演习场时,第八中队已离开现场转移他处,正在寻找部队时遭到射击。但平安无事,只是内田一等兵的乘骑右侧缰绳被射穿了。(18页)

这里也有不明之处。首先,岩谷兵治曹长和内田市太郎一等兵到丰台的时间是7日“午后11时57—58分左右”(《第三大队战斗详报》)。正像坂本写的那样,一木听到报告后立即“令大队警备出动,援助第八中队,并令岩谷曹长归队”。(第17页)岩谷和内田8日零时左右离开丰台,返回第八中队。如是,此二人从那时到遭到“射击”的3时25分这段时间,就“去向不明”了。倘是迷路了,大队、中队必定看成是个问题。然而,清水、一木的回忆录以及其他的史料都没有提到这一点。更令人费解的是,一木和清水于8日晨2时3分在西五里店相会时,也没有提及这二人的事。其次,“内田一等兵乘骑右侧缰绳被射穿”一说的根据,是当时于一文字山站在一木旁边的宪兵军曹寺田净氏的回忆录,这里也留下了疑点。从前后关系看,被枪击时所处的地点,是距龙王庙中国军队非常近的地方。时间是3时25分。一木用电话向牟田口报告关于枪声的事是4时左右。倘若如此,那就是说,岩谷等仅用30分时间就从龙王庙

① 《东京朝日新闻》,1938年6月30日。

附近来到了一文字山。寻找中队而迷路达3小时之久的该二人,是怎样刚一遭到枪击就在很短的时间内回到了大队主力部队所在地方的?还有,寺田氏写道:他听到岩谷对一木说的是“回中队原来位置时遭到射击的”。^①然而,一木自己却说:“不知道射击什么”^②,并且,根本就没有触及岩谷等的事情。我认为,一木如下的回忆才是真实情况:“听说森田中佐被派到当地进行调停,我想这样一来,战争就不可能了,因此,向联队长作了夸大事实的报告。”^③没有料到,一木在这里泄露了天机。

另外,4时20分,牟田口采纳一木的意见,下达了攻击中国军队的命令,正像坂本氏所指出的那样,这是基于“射击”导致“和平交涉的可能性完全丧失”的判断,也可以说是基于再“隐忍”下去,“日军的威信将丧失殆尽”、“不得不发动自卫权”的判断的结果。可是,牟田口判断所依据的“射击”本身就存在着问题,是靠不住的。何况,一木呈报的是“夸大”事实的意见。在此还有必要指出,牟田口作为军人,当时仍保持着对形势的冷静判断,即“不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行动,是局部事件”。^④正因如此,他们又认为,现在攻击一下中国军队也不会出大问题。牟田口的这个判断,是在调查了北平市内第二十九军要人住宅情况的基础上作出的。

二 所谓的“中国共产党计划”说

坂本氏在《关于卢沟桥事件爆发的一个实证》的结论部分中,叙述了“中共计划”说:

第二十九军在卢沟桥事件的数月之前,就进行了对日抗

① 寺田净:《第一线所见之卢沟桥事件》,中央公论事业1970年出版,第123页。

② 《东京朝日新闻》,1938年6月30日。

③ 《卢沟桥事件的回顾》,《偕交社记事》,1941年7月,第53页。

④ 牟田口:《中国事变爆发时的真象及其前后情况》,昭和16年4月,《华北作战史要》。

战的准备,在卢沟桥附近的该军,7月6日作了战争部署,从7日夜到8日晨向日军三次射击。事件一发生,中国共产党立即于8日向全国发表了对日抗战通电。由此可以判定,卢沟桥事件的爆发,是中国军队根据共产党的谋略,有所准备,并抓住日军夜间演习之机,暗中挑起的。因此,决不能认为该事件如通常所说的是偶发事件。(34页)

由上可知,坂本氏的“中共计划”说,其根据是如下3点:

1. 第二十九军在事件的数月之前就进行了对日抗战的准备;
2. 第二十九军从7月6日开始作了战斗布置;
3. 7月8日的中共《通电》。^①

这里,我想再次指出这样的事实,即连牟田口联队长也都认为事件(“第一枪”)“不是中国军队的有计划行动”。在这样的前提下,就坂本氏的3个根据,进行逐条研讨。

(一)关于第二十九军在事件前数月就进行了对日抗战准备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坂本举出了两件事。第一是所谓的第二十九军副参谋长、中共党员张克侠的“积极攻击作战计划”(31页)。然而,倘若以这个“作战计划”的存在作为“中国军队计划”说的根据的话,那么,以中国驻屯军司令部于1936年9月策定的“昭和11年度华北占领地统治计划”为依据,主张“日军计划”说,其根据不是更充分吗?可是,坂本氏却忽视了这一点。退一步说,如果以张克侠的“作战计划”作为“中共计划”说的根据是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以国民政府参谋部在此之前策定的“民国廿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作依据,主张“国民政府计划”说,也是无可非议的。这里,坂本氏是不是过高地评估了张克侠的“作战计划”?

① 坂本氏很重视事件前一天(7月6日)冀北保安司令石友三向今井武夫预告将发生事件这件事。而石友三这段话,又是出自今井武夫《卢沟桥事变真相》(1938年7月),第43页。

其次,关于第二十九军在事件前加强对日军的防御问题。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试想,第二十九军面对日本于1936年5月增强中国驻屯军,平津地区秋季大演习,1937年5月开始的在卢沟桥一带夜以继日的演习,而努力提高抗日意识,巩固防御,不是很自然和可以理解的吗?其实,实际情况是,中国驻屯军已“策定奇袭中国军首脑宅邸兵营城门等计划”^①,并为实施计划进行了调查。卢沟桥附近的演习,虽说是苏作战演习,然而,谁都知道这也是准备对第二十九军作战的训练。在《中国驻屯步兵旅团的作战》文件中,有如下的记述:

实行本战斗的地域,由于去年秋季的假想敌演习,大致已熟悉了以八宝山为中心的地形;特别是驻在丰台的步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因为是以卢沟桥为中心的周围一带作为该部队的演习场,也相当具体地了解了当地的地形。(257页)

所谓的“本战斗”,无疑指的是与卢沟桥事件相关的战斗。中国当局若对日军连日来在自己的眼前进行这样的演习而不加强警戒的话,那也太有失军队的面子而不成体统了。事件前加强防御设施,也是同一道理。此外,坂本氏还引用了武月星等编的《卢沟桥事变风云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中的一节(168—169页),这段文字很可能是《卢沟桥附近战斗详报》中一节(前引《现代史资料》(12,第339页)的摘要,不像是中国方面独有的资料。

(二)关于第二十九军7月6日以后的“战斗部署”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坂本氏是如下记述的:

7月初,中国共产党北方局和刘少奇,派遣联络员肖明,通过张克侠副参谋长向宋哲元军长提出了“以攻为守”战略方针。张副参谋长还将这一方针提交给第二十九军高级干部会,得到了官兵的支持。然而,宋哲元军长这时恰好回到山东乐陵家乡,未能作出决定。(8页)

^① 《卢沟桥附近战斗详报》,《现代史资料》(12),,みすず书店1965年版,第338页。

这段记载无疑是出自木铁编《佩剑将军张克侠》(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中的《张克侠同志生平活动大事记》(357页)。根据该《大事记》的记载,“中国共产党北方局和刘少奇”,通过张克侠,提出了“以攻为守”的战略方针,并被认为此事发生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其实,这个记载的根据是该书所收入的胡华《卢沟桥事变前后的张克侠同志》一文(69—70页)。该文既没有说“7月初旬”、“七七事变后的初期”,也没有说“中国共产党北方局和刘少奇”,而只是说“中共北方局”。同样,该书所收入的张寿龄《颢见》(72页)、陆诒《坚毅沉着的张克侠将军》(112页)等,都认为是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张克侠才提出这个战略方针。当然,也有把张克侠提出这个计划的时间认定为1937年4、5月间的。如该书收录的何基沣等《为民族存亡运筹帷幄》等文,就认为张克侠提出这个计划的时间是1937年4—5月,即七七事变前向宋哲元提出的,并得到了宋的支持(66页)。曹子亚主编《北京地区抗战史料——纪念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五十周年》(紫禁城出版社1986年版)所收入的论文,也有这样的看法。究竟哪种记述是正确的,实难确认,只有寄希望于中国学者了。

坂本氏还以第二十九军旅长何基沣、守备卢沟桥的金振中营长的回忆录,作为认定中国方面进而是中共“计划”说的有力证据,然而,这些都说的是对日方作法的反击,并没有显示中国有了积极挑起战斗的“计划”。回忆录虽表明了第二十九军抗日意识高涨,但不能因此就视其为“计划”说的根据。

(三)关于中共中央7月8日《通电》问题。

历来存在着以1937年7月8日的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作为“中共计划”说的有力根据的见解。而坂本说的新奇之处仅在于又增加了两个“旁证”,即当时外务省东亚第一课长上村伸一氏和中国派遣军特种情报部平尾治氏的回忆。但是,我认为此二人的回忆是存有疑点的,作为“中共计划”说的根据并不可靠。下面就这个问题加以说明。

上村伸一氏在其《灰亡之路——我的昭和史》一书中，有两处触及了这个问题：

1. 7月8日晨，我被电话叫醒了。外务省通知说，昨夜在北京郊外卢沟桥发生了日中两军间的冲突事件。（66页）

2. 中国共产党迅速地宣称这个事件标志着日本侵略华北的开始，发表了全国一致抗日通电。我直感昨夜的射击准是共产党干的。（67页）

外务省是在什么时候收到卢沟桥事件发生的第一次报告？上村氏又是在什么时候看到了这个“通电”的？其实，当时上村正在同其上司石射猪太郎东亚局长研讨如何收拾事态问题。石射回忆：“7月8日拂晓，外务省来的电话把我叫醒了。”^①倘若如此，外务省当是“7月8日拂晓”才收到关于事件的最初电报的。这一点，石射和上村的回忆是一致的。可是，参谋本部收到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的关于事件爆发的第一次报告是7月8日晨5时45分。如是，同外务省的联络当然是在第一次报告之后的事了。这样一来，所谓“拂晓”的说法，是不是有些太超前了呢？这里的重要之点在于，石射的回忆并没有像上村记述的那样说见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通电”。不仅如此，石射同上村的“我直感昨夜的射击准是共产党干的”记述恰好相反，很有感触地写道：“对熟知柳条沟事件的我们来说，‘又干起来了’。”^②这也可以理解为“日军谋略”说。石射和上村二人回忆为什么出现了如此之不协调呢？

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通电》是在什么时候传到外务省的呢？关于这个问题也有资料可循。外务省外交资料馆收藏的《松本记录中国事变第三卷》（松·A·—·—·D·三〇）中的外务省情报部《时报周刊》第139号（昭和12年7月27日），以“中国共产党通

① 石射猪太郎：《外交官的一生——对中国外交的回忆》，太平出版社1972年版，第238页。

② 石射猪太郎：前引书，第238页。

电”为题,有如下的消息:

据汉字报纸报道,卢沟桥事件刚一发生,中国共产党立即于7月8日向南京政府、全国各军队、党部、各报社发出了如左的发动全国抗日战争的通电……(概要转载了《通电》内容)所谓的“汉字报纸报道”;具体是指那天发行的哪份报纸,实难确定。但第138号是7月20日发行的,因之最早也只能是7月20日之后的事了。我们不知道外务省是否还有另外的管道获得这个《通电》。但我认为,外务省在7月8日是难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通电》内容的。因此,坂本氏的以上村回忆作为“中共计划”说之根据的推断,也就难以成立了。

还有,7月14日《阪每日新闻》,以“共产军提出同第二十九军共同行动”为标题,报道了如下消息:

眼下在陕西省北部、甘肃省等地的共产军首领朱德、毛泽东、彭德怀等联名向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发出了同第二十九军采取同一行动,反击日军的通电,并明确表示共产军应作为政府军采取行动。

这是“上海本社特电(13日发)”^①。另外,7月15日《阪朝日新闻》也以“共产军也合流”为标题,作了比较详细的报道:

据14日午后7时送到陆军当局的情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徐向前、刘伯承联名,向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冯治安发出如下内容的通电:

欣闻第二十九军英勇抗日,义愤填膺的红军将士随时出动,追随贵军,决一死战。全军奋勇杀敌,响应通电。

该报还登载了“也通电蒋”的消息,内容如下:

同盟南京14日电,共产军朱德、毛泽东等13日致电在庐山的蒋介石:

① 这些电报都刊登在日本报纸上。关于平尾治氏的回忆录,是承蒙秦郁彦氏的关照而知道的。

国民革命军一分子之吾人，中央命令一下，率所属部队，奋斗在国防最前线。

对此，蒋介石发出感谢电，表示在适当时机，将烦劳协助。

可以认为，《大阪每日新闻》和《大阪朝日新闻》的消息，即中共致电二十九军干部，是同7月13日《新中华报》所载《致宋哲元等电》中“红军将士义愤填膺，准备随时调动，追随贵军与日寇决一死战”是一致的；《大阪朝日新闻》的第二条消息，即中共致蒋介石电，也同《致蒋委员长电》中“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是相一致的。关于《致宋哲元等电》的新闻来源，《大阪每日新闻》说是“上海本社特电(13日发)”，而《大阪朝日新闻》只报道是“根据14日午后7时送达陆军当局的情报”，至于这个电报是什么时间发出的，则没有明确记载。不过，综上所述也可以推定为是13日发出的。关于《致蒋委员长电》，则明确记载着是13日发出的。鉴于上述情况，应该指出，这两份《通电》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解放》第1卷第11期(1937年7月15日)所载的同一电报所署日期是不同的^①，不是7月8日发出的，而应该是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7月13日)上发表的同一天拍发的。这样的解释是比较合理的。成为问题的《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最早发表在7月13日的《新中华报》上，接着《解放》(1937年7月15日)也刊载了。时间确实都写着“7月8日”。不过，同上述两份“通电”一样，也可以推断为是7月13日发出的。至少，到现在还没有发现是8日发出的证据。

第二个“旁证”是平尾治的《特种情报机关长的手记——我的暂短青春》(个人出版，1992年)的记述。坂本氏依据这个回忆录

① 最近复印了一部分《解放周刊》(第1卷第10期)，是上海市图书馆所藏资料，时间是“中华民国廿六年七月十二日”，《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确实收录在这里。该号是《西班牙专号》，但在目录中却没有列出“通电”名称，不知何故。

写道:

驻在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内设有特种情报班,担当无线情报收集工作。其中一名通讯员,在卢沟桥事件发生的7月7日深夜,旁听到被认为是从北京大学院内邮电所拍往延安中共军司令部电台的明码紧急无线电报,往返连续3次,内容是“2052 0501 0055”(成功了)。该邮所的发报员、电报内容来源以及情报途径等都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情报是出自利用前述的第八中队于7日晚10时40分左右,向假想敌空弹射击与中国军队从该中队后方实弹射击之机,成功地让日中两军冲突起来的有关方面。因之这份紧急无线电报,是搞清卢沟桥事件暗中关系的重要线索。(17—18页)

但是,应该指出,这份电报并不是平尾氏亲自“旁听”到的,而是多年之后在华北方面军工作时,从其上司秋富繁次郎那里听来的。所谓“一名通讯员”,既不是平尾氏本人,也不是秋富氏。而且,这段记述也不是出自当时日军有关人员的回忆录、文件。如果当时中国驻屯军真掌握了这个事实的话,必然加以利用,进行反对中共的宣传,但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因此说,这段记述是否真实,值得怀疑。

当时,平津地区同延安的联络,是在天津的刘仲容家,通过华北联络局线路进行的。有关人员已证实了这一点。

如果说是“7月7日深夜”(平尾氏原文如此),充其量也只是事件发生后的一个小时之内。那么,卢沟桥当地和“北京大学”是怎样联系上的呢?“空弹射击”和“实弹射击”之间,也只是几秒,最多也不过几分钟的时间,可是,此后直到8日晨3时25分“射击”之时,日中两军并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不能说是“成功了”吧?一般而言,也不应认为中国共产党员会用“明码”电报进行如此重要的联络,而译解中共的密码也是相当困难的。当时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参谋部第三课参谋且负责情报收集的横山幸雄少佐,就1941年2月译解一部分中共密码一事有如下的记述:“中共的密码与重庆方面

的不同,译解是非常困难的,但昭和16年2月中旬,终于译解了一部分,开拓了前人未曾涉足的领域。”^①

综上所述,不能不认为,以平尾氏的回忆录作为“中共计划”说的根据,是脱离历史实际的臆想。

卢沟桥事件,仍有不少不明之点,如清水中队长为了与在丰台的大队部联络志村二等兵返回部队一事,除岩谷等外,又派出了传令兵。有人说,传令兵是一木出动后到达的。^② 这名传令兵究竟是谁呢?他至迟应该于8日晨1时左右到达丰台,可是,此时大队本部以及在北平的联队本部都已知道“去向不明士兵”问题不复存在了,按理说事情也算解决了。然而,事情并非如此,这是为什么?又如,第二十九军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虽清楚了一些,但仍有疑点有待查明。希望中日双方共同努力,进一步研究卢沟桥事件问题。

(作者单位:日本神户大学)

(译者单位:长春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

(责任编辑:荣维木)

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383页。

② 《清水节郎手记》,秦郁彦《日中战争史》增改版,河出书房新社1972年版,第165—167页。